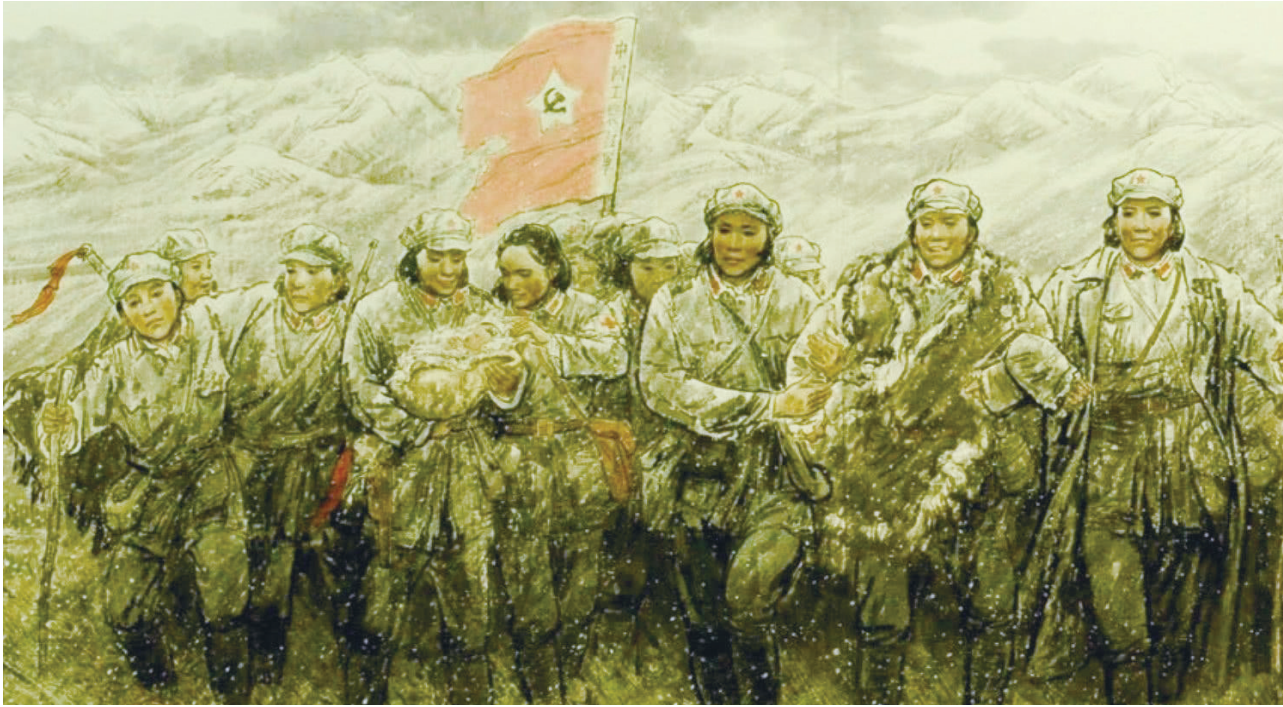




长征：她们用女儿身铸就丰碑

□ 刘建军 刘翠莲



妇女是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军。长征路上，活跃着一群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她们是中华民族的女英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她们的长征，汇成了意气风发的时代亮色，是用信仰、意志和情怀铸就的不朽丰碑，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不得八块钱”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刘英、贺子珍等30人；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琼英、陈罗英等20多名女同志，分别担任干部、机要员、炊事员等工作，分编在部队各单位；红四方面军有妇女独立师约2000多名女战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有张琴秋、林月琴等人；红二十五军有7人，均为部队医院护士。

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不但要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边走边战，还要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他们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极端的艰险和困难。女红军虽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她们不怕牺牲、勇于奋战，同样体现了红军战士的英雄气概。贺子珍说：“想到革命，想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面前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小脚女战士王泽南用“三寸金莲”征服了万水千山，很多人都在她的感染下坚持了下来。她说：“世人都说长征难，但只要心中有信念，长征的险难也是可以忍受的。”

党和红军是劳苦民众的救星。很多女红军参军前没有正式姓名，没有文化，更没有社会地位，是革命给了她们自立自强自主的机会。她们由衷感到红军就是自己的家。红一方面军的李坚真很小时便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参加红军后，在党的教育下，她开始将内心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贫苦百姓尤其是妇女的同情，转化成要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要为民众谋幸福思想和行动。红军中像李坚真这样的女战士很多，她们坚定不移跟党走，再苦再难不动摇。

长征时红军有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部队会给8块大洋，将其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女红军就提出“不掉队，不带花（负伤），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口号，她们坚决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离红军。

曾任康克清警卫员的女战士罗坤，当时只有13岁。她带着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返归，回来时部队已经北上。一路上，她们靠乞讨、挖野菜过活，战胜了疾病、饥饿，躲过了野兽、土匪，终于在3个多月后追上了队伍。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由于艰苦的战斗、严重的饥寒和伤病，女红军减员严重，很多人长眠在了雪山草地上，为

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保大锅而牺牲

丁玲采访长征女战士时感慨万分：“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红军女战士除了面对各种艰难险阻，还要克服自身性别带来的一系列特有困难，需要付出更多辛苦和牺牲。但她们表示：男红军能吃得消，我们也能吃得消，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

生死存亡的战斗、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短缺，使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们都剪成短发甚至剃成光头，扎着绑腿，穿着草鞋，背上斗笠，扛起长枪，和男红军一模一样。

爬雪山、过草地，最考验人的体力。一般每名女战士负重18斤左右，并且要以很快的速度才能保证跟上队伍，可以说她们每天都在与体能的极限作斗争。炊事班的女战士除了背着分配给她们的四五十斤东西外，有的还背着铁锅。铁锅可以煮饭、烧热水，对战士们来说太重要了。妇女工兵营的伙夫班长贾德福就这样始终背着一口大锅，过草地时，在敌人的一次飞机轰炸中，她把锅压在了身下，自己却中弹牺牲了。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工兵营是一支坚强的运输队伍，数千名伤员，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的机器和8万人的吃穿用等物资，许多都是由女战士转运的。成百上千的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运粮食、挑行李、抬担架、背物资，她们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拼尽全力完成任务。

漫漫长路上，女红军们基本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躺下睡着。劳累、饥饿、寒冷、潮湿使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甚至终身不能生育。有的女战士得了干血癆，在没有医疗治疗的条件下，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最难的，是长征路上生育孩子的母亲们，每一次新生命的孕育诞生，都是对她们的生死考验。怀有身孕的女战士并没有多少特殊待遇，不仅要和大家一样负重行军，就连分娩也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和抚养条件，很多孩子出生不久便夭亡了；有的孩子托付给当地老乡家寄养，却再也没能找回。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她们饱含着最深沉而又隐忍的大爱深情，她们是最无私的母亲！

“女红军要走三万五千里”

回忆长征路上的战友们时，王定国说，“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女红军在对敌作战中的勇猛顽强得到了朱德的高度评价：“她们在夺取敌人的辎重与武器上，很能胜任。”

1934年秋，李坚真在湘赣交界处的一个山头上，带领红军女战士同敌人展开激战，她们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英勇战斗，实现了安全突围。四渡赤水战役中，干部休养连与敌人的一个营遭遇，邓颖超不顾病痛，率领女战士们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大队赶到。建制完整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是一支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红色娘子军”。独立师师长张琴秋领导队伍单独行动或配合主力部队进行

了大小小数十次战斗，能征善战，谁也不敢小瞧这支娘子军。女战士姜秀英在行军作战中，脚受伤骨折，她从老百姓家中借来斧头，将溃烂的脚趾砍掉，忍着剧痛跟着部队前进。在枪林弹雨中，这些为着革命理想而奋斗的女性，成为英勇无畏的钢铁军人。当时有一种说法：“长征二万五千里，女红军要走三万五千里。”在战前、行军路上、宿营休息时，女战士们都要开展宣传活动：鼓舞红军士气、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扩红工作，有时每天走的路比男红军还要多。每到宿营地，她们要安顿伤员；急行军的间隙，抬担架、保护伤员。过雪山时，抬担架的女战士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伤员的安全。陆定一这样评价她们：“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时时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病员，总是不知疲倦。她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董必武认为红军女战士所做的工作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他这样赋诗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风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取顶半天天。

“野菜充饥志越坚”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来自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她们中有像蔡畅、李伯钊这样曾留学法国、苏联，邓颖超、刘英这样读过女子师范的知识分子，也有出身封建家庭或贫苦家庭，如王定国、杨厚珍、危拱之、王泽南等缠过足的女性。北上抗日、争取民族独立、寻求社会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共同目标使这些女红军们聚集在党的旗帜下，一起用铁脚板走完了长征路。《续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在延安采访长征女战士时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女红军们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炼。长征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康克清说：总算到家了，我得好休息，然后再从头干起。长征胜利会师后，女红军们很快又投入到党分配的新工作中去。经过长征洗礼，她们的意志更加坚定，思想更加成熟，成为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她们中走出了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全国政协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在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上，继续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在长征中，女红军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舍小我而顾大我，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展示了中国妇女勇于参加革命、努力改造自身和社会的力量，构成了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鼓舞我们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1949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全国即将解放。为适应全国胜利后的形势需要，党中央从西柏坡向北京（时称北平）进发。马列学院此时亦随党中央进京。1949年3月27日，马列学院学员和工作人员分乘8辆军用车抵北平，暂住香山慈幼院休整。4月14日，马列学院迁至香山碧云寺西跨院，对外称“劳动大学”。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主要机关均在香山办公。

在城郊等待进城的这段日子里，马列学院的工作也在紧张筹划之中。1949年9月3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签署了“高教密字第[1621]号令”，将颐和园东门外原清华大学农学院房产（现中央党校南院）移交马列学院使用。马列学院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开始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乘建国之东风，马列学院各项工作有序铺开。

1951年6月3日，院长刘少奇写信就马列学院工作作出指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一点及。如“马列学院从明年起将继续加以扩大”，这是一个大的原则与方向。接着，触及具体工作，“请即计划在明年建筑房屋若干，建筑标准以在延安或西柏坡时的建筑为原则，稍加一些改良和计划性即可，即以合卫生、不冷，能住人，便宜、迅速为合格，并准备在十年之后再建筑近代校舍”。刘少奇这份工作函，至今读来让人很受感动。先说信函一开头，便提出了学院扩大办学的大方向，运筹帷幄，接着着眼办学需要的房屋设施，把盖房子的原则、标准、卫生等事项耳提面命交代了一遍，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这封信的结尾还要求：学院作出建筑计划并取得陈云同意，再来汇报确定后，即施工建筑，体现了刘少奇对马列学院建设的关切之情。

交代完盖房子的事宜后，刘少奇又就教学工作作出指示，且看：“马列学院对于工人运动及工

让红色基因永远传承

□ 胡 珍

党校人不少有过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经历，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幸福奋斗了一生，我的母亲胡望便是其中之一。

母亲12岁投身革命，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长征。长征队伍中有不少女红军，其中红四方面军最多，我母亲就是红四方面军里的小红军。

母亲1922年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便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岁月里受尽了苦难折磨。黑暗的旧社会在母亲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33年，红四方面军解放巴中，在得知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是为受苦人求解放时，她便毅然走进了革命队伍，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在党的教育下、在红军队伍里，母亲迅速成长，1934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5年，母亲跟随红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红四方面军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起，先后转战于川西平原、川西北、川西南、西康东部及甘南地区，数翻雪山三过草地，历经艰辛。作为红军文工团宣传队队员，母亲总是走在队伍前面，沿路喊口号唱歌子给战士们加油，常常是一天行军百十里路，脚上打满了血泡，仍咬紧牙关决不掉队，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走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母亲先后在延安抗大五分校和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学习。由于她勤奋刻苦，进步很快，1939

厂管理问题的教学情形，不知怎样？应认真地教一教这一门课，因为我们多数党员对于工人中的问题太生疏了，这就使他们不能很好的领导工人群众。现在全总有苏联教授，财经委员会有专家，也有不少材料，请计划并组织这一门课。”刘少奇这段指示直接关心关涉工人运动和工厂管理的教学工作问题，联系我们党是在一个农业大国中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这样一条道路的无产阶级政党，联系我们确实对农村比城市问题更熟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再联系新中国成立后要迅速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样一个历史任务和使命，就能认识到工人运动特别是工厂管理确实是我们党和党校都需要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马列学院迁至现中央党校南院后，于1950年9月至1952年9月，又连续招收3批学员，编为8个班。学制则延长为3至4年不等。1953年2月，又分设为一、二部，一部专司培训高校、党校的马列主义师资干部，二部则相当于原来的马列学院。在师资方面，此时，学院调入胡绳、郭大力、张如心等学者，从苏联回国的陈昌浩、廖焕星等人也来院工作，再加上原先的杨献珍、艾思奇、王学文、周文、何其芳、何家槐等学者，此时的教员队伍人才济济，群星璀璨，蔚为大观，学院办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



中央党校南院西门

让红色基因永远传承

□ 胡 珍

年当选派跟随中央首长南下赴华中地区担任首长电台的报务员，圆满完成了保障首长与延安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通信联络任务。1939年至1948年，母亲先后在中原局电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电台、新四军第四师无线电训练部、华中雪枫大学、华中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通信处工作，历任报务员、报务主任、电台台长、教务主任等职。在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的革命征程中，母亲逐步成长为我军通信战线的业务骨干。这期间，她曾荣获收发报能手的称号，受到多次表彰和奖励，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被选送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做学员组织工作和党总支工作。1958年被派往天津工作，1962年返回中央高级党校（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母亲恢复在中央党校的工作直至1983年离休。母亲离休后，常被邀请到中小学作报告，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母亲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讲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和红军战士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她说，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本领，建设我们的国家。

2004年，母亲因病逝世。母亲从一个旧社会饱尝压迫和辛酸的童养媳，成长为为人民军队的战士、成长为党的干部教育工作者，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定地跟着党走的一生。

新中国的新党校

□ 谢煜桐

